

「外洋钦差」



卢弘·著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I 25
568

96060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
出
版

卢
弘
·
著

「洋钦差」
外传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钦差”外传/卢弘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ISBN 7-5065-3007-4

I. 洋… II. 卢…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现代
②共产国际-李德-生平事迹 IV. 125

书 名: “洋钦差”外传

著 者: 卢 弘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418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 7-5065-3007-4/I·344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调换)

序

伍修權

李德——奥托·布劳恩，是中国共产党史特别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与中国红军指战员一起亲历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几年内，他名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实际成了中国红军以至中国党的“太上皇”，正由于他的干预、指挥，中国党和红军人数一下损失了90%以上，党在南方的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迫使各路红军来了那次艰苦长征。

对于那段历史，国内外不断有人在进行研究。由于当时我正为李德作翻译，目睹耳闻了他的各项活动，就时时有人向我访问查询有关李德的事，我也应邀写了一些回忆和文章，还支持或审看过有关的文稿，似乎成了李德研究的“权威”，其实这与我当初为他翻译一样，都非我所愿。我所知的仅限于自己直接接触的一部分，所以我也希望能看到较为全面具体地评介这个人物的作品。这本《“洋钦差”外传》，总算填补了这一空白。

作者曾多年帮我和几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和写作传记，搜集研究过许多史料，访问过不少历史见证人，还去瑞金、遵义等地及红军长征路查访过，不仅对这段历史及李德等有关人物比较熟悉，还有了自己的发现和看法，尽管他所写的未必事事详尽无遗完全

准确无误，却都是自有所据的研究所得，至少也是一家之言。他用文学手法来生动形象地再现当时历史及其人物，也更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所以我赞成这本书的出版，并且希望能将有关李德以及各个历史事件与人物之谜一一解开，为后人留下更为丰富翔实的历史教材。

前 言

读者朋友：在您面前打开的，也许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台戏，一台真实而生动的革命历史活剧。它将告诉您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德国人，受莫斯科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发扬“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未必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结果把所向无敌的工农红军折腾得几乎全军覆没，还把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度搞得稀里哗啦。又恰恰由于这个外国人的错误，迫使中国党和红军来了一次25000里长征，却又为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奇迹，致使每个中国革命者以至许多中国人都以此引为自豪。

本书要说的，就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这个故事确是很像一台戏：原为俄罗斯古典名剧的《钦差大臣》，它于20世纪30年代被翻译移植到中国的军事政治舞台上，并由中外几国“演员”同台联合演出了一台东方版的新编“钦差大臣”，只是由于有人将原来的喜剧当作正剧来演，反而演成了闹剧甚至丑剧，最后又以悲剧闭幕收场，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令人笑不起来的“笑话”。

作者还想声明一点：本书主要是写给对革命历史有兴趣却不求知其详也不拟深究的读者们看的，而不是供党史专家和历史学者考证研究用的。若勉强打比，它近似《三国演义》式的文学作品，而非《三国志》式的史学专著。但我力图比“演义”提供更多的“史”，又适当比“志”增添较多的“文”。能否如愿，只得有待读者评定和专家指正了。

目 录

序	伍修权
前言	(1)
开 篇 被“定格”在遵义的历史画面:长征红军中有个“洋鬼子”	(1)
第 一 章 “红都”瑞金的“独立房子”和一个令人闻而生威的神秘人物	(4)
第 二 章 “洋钦差”在土舞台上粉墨登场,据说是个会念经的“外来和尚”	(11)
第 三 章 不同版本的历险故事,中国“契卡”的“独家旧闻”	(22)
第 四 章 “红都”主人给“国际钦差”送来了意想不到的“见面礼”	(32)
第 五 章 用“罗明路线”整“毛派”却越整越多,判处萧劲光杀不了“鸡”又没吓住“猴子”	(44)
第 六 章 苏区东邻又出了一个“首都”,三国鼎立“孙刘”联盟不成	(56)
第 七 章 到嘴的“肥肉”全都“飞”了,坐山观“狗”斗却被“狗”咬了	(67)
第 八 章 “洋顾问”为土舞台大增戏剧性,独角戏不好唱再演“群英会”	(83)
第 九 章 “大国统帅”的“宏图大略”,“太上皇”纵论“短促突击”	(105)
第 十 章 “北大门”失守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发火痛斥	

DK92/12

	李德洋“崽”.....	(123)
第十一章	外部敌情引发“内部险情”，“四大金刚”眼看失去两位.....	(139)
第十二章	“洋钦差”竟是“骚骡子”，“红都”秘传“桃色新闻”.....	(154)
第十三章	紧锣密鼓准备战略大转移，谁去谁留成了最挠头问题.....	(170)
第十四章	博古收回成命改变了一段历史，红军告别苏区今后的命运莫测.....	(187)
第十五章	“叫花子”抬“轿”边走边挨“狗”咬，蒋家军布阵专等“残匪”落网.....	(203)
第十六章	江山虽如画前景却很不太妙，政治动员令挡不住敌军围攻.....	(218)
第十七章	“追剿”大军如狼似虎红军受重创，湘江血战损失惨重应追查原因.....	(232)
第十八章	老山界红军进山毛泽东要“出山”，通道城可通死道也能通向活道.....	(247)
第十九章	毛泽东嫁“病”于人李德打开了政治“摆子”，“狡猾狡猾的共军”突破乌江又占领遵义.....	(266)
第二十章	李德又到“湘江”见到“滑铁卢”，毛泽东长夜不眠要做大文章.....	(283)
第二十一章	从中国酒看中国人和中国的玄机妙事，主报告挨批副报告好说反报告一鸣惊人.....	(298)
第二十二章	集中火力一致猛攻进口“太上皇”，留有余地努力团结党内大多数.....	(313)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引而不发缓坐“头把交椅”，“洋顾问”告别“舞台”难找有缝的“蛋”.....	(335)
第二十四章	难关重重中央遇险红军一分为二，千山万水来到陕北国际又来“钦差”.....	(355)

第二十五章	新任国际代表到中央,老“钦差大人”没戏,红军 长征胜利结束,李德仍在坎坷“途”中……………	(383)
第二十六章	下台“演员”不甘寂寞仍在到处“表演”,革命圣 地兴盛红火李德乐不思“蜀”……………	(405)
第二十七章	土山土城土八路中的洋人洋事洋新闻,中央秘 密开会王明生“病”李德欣逢知音……………	(428)
第二十八章	“洋钦差”虽认错其检查却未能公布,李德回 苏联总算过了关却又情结未了……………	(444)
第二十九章	丢掉“枪杆子”拿起“笔杆子”这才成其“大业”, 不再沉默爆出冷门著文出书自招驳斥批判 ……………	(457)
第三十章	“洋钦差”来历不明看来是老一代“克格勃”,国 际顾问历史之谜成了“李德巴赫猜想”……………	(476)
尾 声	“活剧”早已落幕,作者意犹未尽,仅供“陈景润” 们回顾反思参考……………	(496)
后 记	……………	(502)
致 谢	……………	(504)

开 篇

被“定格”在遵义的历史画面：长征红军中有个“洋鬼子”

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著称于世的中国贵州省，在1934年和1935年除旧迎新之际，连日阴雨的天空忽然阴转多云，还从云缝中漏出几缕真如“贵阳”似的珍贵阳光；原本崎岖峥嵘的山野村寨里，也显得不再平静和不大安定；一些连一分“银”也掏不出的被称为“干人”的穷汉们，都在窃窃私议地传说或打听着什么，以致开始萌动、躁动和骚动起来。

伴随着由东而西又向北的阵阵枪炮声和人喊马嘶声、军队行进的疾速奔跑声及其辎重队的扁担咯吱声、担架队的哼唷呻吟声，黔北山城遵义从城门口到大街上，在阳历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出现了一种说不清是喜庆来到还是灾祸降临的奇异气氛。一队队青年学生，一伙伙手工业工人、店员伙计和贫穷市民，被一些忽然从“地下”冒出来的被称为“赤党”、“异党”或“过激党”的共产党员和热诚分子，鼓动、发动和推动着，一批批走上街头，去欢迎他们虽已耳闻却未目见的中国工农红军。他们手中打着的各色三角小旗和墙上贴着的红绿纸标语上，写着一条条他们自己也不大明白的口号：

“热烈欢迎朱毛红军！”

“欢迎朱毛总司令！拥护中华苏维埃！”

“红军是干人自己的队伍！”

“打倒国民党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

在参差不齐的口号声中，人们发现，在几面中间缀着镰刀、铁锤和黄五星，旗杆边白布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等字样的红旗下走着的队伍，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威武神气，不仅衣帽不整，武器不齐，几乎人人都一身汗渍、泥污和血迹，还有不少人吊着胳膊、包着脑袋和拐着腿，其瘦弱、零乱和疲惫的样子，与正在街上欢迎他们的“干人”相比，真成了哥们兄弟、不分彼此的“干人自己的队伍”。不过，人们又发现，队伍中也有一些服装相对干净整洁，保养得也还可以，不背长枪甚至不打绑腿，只背着皮包和干粮袋，有的还挎着小手枪的人，在他们后边，又出现了一些骑马的人。

“看，那骑马的，还有眼镜框，戴着花镜呢！”欢迎者中有个眼尖的，指着走近的队伍，向他的同伴招呼道。

“嗨，戴眼镜的，有好几个呢！”他的同伴也看到了。

“是红军的头领——朱毛总司令吧？”

“不是还有姓苏的，叫苏维埃的吗？”

“看咧，那个块头最大，个头最高的，鼻子咋那么大？”

“是咧，他那眼睛，抠进好深噢！”

“还长着黄毛毛络腮胡，像个洋鬼子。”

“对头，那面皮和手，都那么白嫩，像是白种洋人。”

“是咧，就是个洋人。”

“红军里咋有洋人呢？”

.....

几个护卫着这个“洋人”的红军战士，听到路边人们的议论，有

的忍不住笑了，有的抬头看看他。他自己也有所觉察地把眼镜朝上推推，将滑到下巴上的大口罩，重新捂到了高鼻子上，还把八角军帽的帽舌又朝下拉拉，这不仅使其眉眼更加深邃莫测，也使他的长相、个头和举措，更为引人注目。路边上的欢迎人群中，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传道：

“看到吗，洋人，洋鬼子！”

“一个洋鬼子红军！”

“红军里有个洋鬼子！”

……

人们见的说的都没错，那个确实是个“洋鬼子”，并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唯一的一个外国洋人。中央红军长征时，除他以外是还有几位朝鲜和越南籍的外国同志，但是他们同中国人一样也是黄种人，因此都不属“洋人”之列。来到遵义的这位，却是个出生于遥远的欧罗巴洲、属于雅利安血统的正宗“洋鬼子”。在别的长征红军中，也曾有过被偶尔裹挟进来的外国传教士，那倒也是纯种洋人，但他们仅仅是长征时一段路程、较短期间内的参加者，远不如这位不仅历时几年、自始至终和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一样，走完 25000 里全程，更曾是红军长征的最早决策者和最高指挥者。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红军的长征，一度听命于他的中央红军以及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也不会来到偏僻闭塞的黔北山区来，遵义大街上也决不会出现他这么个“洋鬼子”红军。

不过，又正是在遵义，这个“洋鬼子”在中国特别是在红军中的崇高地位及其辉煌业绩，至此突然画上了句号。从他个人到整个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从哪儿来？来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这一切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我们且把他和长征红军“定格”在遵义，将故事的“镜头”闪回到 1933 年秋中国的“红都”。

第一章

“红都”瑞金的“独立房子” 和一个令人闻而生威的神 秘人物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上有过两个号称“红都”的苏维埃京城，一个是欧洲名城莫斯科，另一个在中国。不过敝国的这座，别说是外国人，连我国同胞也知者不多。那只是位于江西省南部山区的一个小县城——瑞金，当年忽然时来运转，一下成了什么“瑞京”。

别看这个“瑞京”小得连全国地图上也找不到，当年却因为是九州大地上的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机关驻地，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红色战士心目中的圣地，也是当时统治着全国的国民党政权及其领袖蒋介石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心腹大患。

那时的中国，从南到北，主要在南方，从东到西，大都是东部，有着几十块甚至不计其数块，大到几个县，小到个把区或者只有几座山头的革命根据地，像一个个孤岛似的，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海”之中。瑞金地处当时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闽（西）粤（北）赣（南）边界地区的中心。20 年代末，原来在湘赣边区井冈山上的朱（德）毛（泽东）红军，打进了这块地盘，又陆续攻下了几座县城，瑞金是其中之一。1931 年 11 月 7 日，苏联十月革命 14 周年纪

念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召开了全国工农兵又称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宣布瑞金为临时首都。这一带就此被称为中央苏维埃区域，简称中央苏区。

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之时，原来藏身于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于国民党军警日益加紧搜捕，内部又不断有人叛变投降出卖组织，党的地下机关越来越难以立足存身，不得不悄悄撤离了自己的诞生之地，陆续转移南下潜入苏区，来到了“红都”瑞金。由于中央机关的正式迁入，瑞金这个并无名声的荒僻山城，突然成了全国工农革命及武装斗争的最高指挥中心，这里也就发生和演出了一幕幕既是空前又属绝后的，从人间到政坛，特别是军事战场上的生动活剧。

其中的一幕，就是中央机关进入苏区的当年，即1933年金秋时节开场的。戏中的也就是本书的主角，也在后台装扮完毕，只待粉墨登场了。

是年稻谷收上场不久，设在瑞金西乡沙洲坝的军委机关和红军总部，突然悄悄忙碌起来。那时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的居住及办公地点，主要利用原有的庙宇、祠堂或借用现成的农家民房，极少自己修盖专用房屋，这次却破例地小兴土木砌房造屋，根据中央领导人的具体指示和勘察指定，人们在红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附近一处前不靠村、后不挨店的水稻田中间旱地上，利用一座早已破损的古庙旧址，在原有基础上快速翻修改建成了一座砖瓦新房。由于它远离村舍，独踞田间，不久就被人借用观测目标用的军事术语，命名为“独立房子”。

开初谁也不知道这座“独立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给什么人住的，眼尖的人发现，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把手”博古（又名秦邦宪）和被称为“中国捷尔任斯基”（苏联保卫机关“契卡”的领导人）的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在新房建成前后曾经亲自来视察检查过，除他们以外的党和红军各级干部，对此都不明底细，也不宜过问。

“独立房子”竣工落成并验收合格以后某日，正在中央保卫局

担任执行科科长的卓雄，被顶头上司邓发悄悄叫到一边，交代了他一项绝密任务：

立即挑选十几个政治上绝对可靠、斗争中特别坚决、作战时非常勇敢，又极其机智灵活的、在党内担任过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红军干部，每人配备快慢机和手枪双武器，带足子弹和干粮，一律换成便服，由他带队去闽南、粤北之间的苏区和白区交界地带，与设在当地的秘密交通站接上头，迎接一样极其重要的“东西”，务必万无一失、绝对保险地安全护送到“红都”瑞金来。

邓发将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暗号等交代给卓雄时，又神秘地说：“你们负责迎接的这个重要‘东西’，既不能抬，也不能背，更不能碰。如有损伤，唯你是问。万一落到敌人手里，你就提着头来见我！”

卓雄临出发时，邓发又悄悄对他说：“告诉你，在你们小队两侧，另有大部队负责掩护和接应你们。你只管放心去吧！”

那时才十八九岁的卓雄，好奇又性急地问道：“让我们去迎接的，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啊？”

邓发却瞪了他一眼，严肃地说：“你是个老保卫，怎么忘了纪律规定，该你知道的不用问，不该你知道的不准问，你只管执行任务！”

卓雄咕嘈道：“真没执行过这样胡涂任务。”

邓发脸一板道：“怎么，你再罗嗦我就叫别人去！”

卓雄忙说：“不，不，还是我去。明确任务也是我的职责嘛！”

邓发道：“还不快出发！”

卓雄高兴地对他“拍”地一个军礼，“是，保证完成任务！”

若干天后，他果然如期完成了任务，没有提着自己的头去见邓发，而是护送着一样特别的并不是“东西”的“东西”，安全回到了瑞金。有人悄悄问他这些天干嘛去了，他神秘地一笑道：“不能说。”再问就说：“你想让我犯错误？”只是有一回，先用嘴巴朝“独立房子”努了努，马上又用手指按住，还是什么也没说。

就在这时，正在红军学校学员团任政治委员的伍修权，奉军委命令立即交代了原来的工作，带上背包按指定时间到刘伯承总参谋长处领受新任务。他领命报到时，刘伯承一反往常地没有用他平时的四川官话，一开口就是纯熟的俄语，对伍修权招呼 and 询问起来。

当伍修权莫名其妙地用自己惯常的湖北话回答时，却被刘总长笑着止住，叫他也用俄语回答问题。

伍修权从命说开了俄语，刘总长一面注意地听着，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他详细地向伍修权问了许多事，伍修权一一回答后，刘总长把他拉近自己坐下，压低声音说：

“中央了解到你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担任过几年专职俄语翻译，现在仍能熟练使用俄语。中央最近决定，你再干老本行，执行一项重要的翻译任务。”

伍修权说：“可是我现在……”

刘总长按住他肩膀说：“我知道，你不大想到领导机关来工作，在下面部队又已经担任过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不过现在非你不可，并且是降格使用你。据我所知，你不是个闹地位讲名利的人，你会想通的。”

伍修权说：“其实你是了解的，我从苏联回国来，最大的愿望就是直接参加武装斗争，我还想搞军事，不想再当什么翻译。”

刘总长点点头道：“我知道，不过这次调你来，是中央的决定，你我都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向来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伍修权，听了刘总长这话，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小声问道：“给我的工作任务，能再具体一些吗？”

刘伯承说：“可以，你附耳过来。”接着就更挨近他，更小声地仍用俄语说着，伍修权边听边以俄语答应着。刘伯承说了一会，又恢复平常声音道：“我只能说到这里，到时候，你多听听中央领导同志的，他们还要向你直接交代任务。”

伍修权听了，重新坐正身子，严肃地说：“我服从中央决定，也

感谢中央和您对我的信任，我努力完成任务。”

刘伯承这才站起来，拍拍伍修权的肩膀，改用他日常的四川乡音道：“要得，我晓得你会这样。不过不是‘努力’完成任务，而是‘一定’会完成，对不？”

伍修权也忙站起来，对刘伯承挺胸立正着道：“是，总长，要一定完成任务！”

刘伯承说：“好吧，我这就带你去。”说着领先走向门口。伍修权忙跟出去，刘伯承回头说：“把背包带上，全带上。”

伍修权遵命背上背包，跟刘总长出了门，又走向了村外，一直向那座刚砌好的神秘的“独立房子”走去。

他们越走近“独立房子”，越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通向“独立房子”的路口和房子周围，布置了几层哨兵，有的还不是一般的警卫战士，竟是中央保卫局的干部。又有几个电话兵在通信参谋带领下，正在为“独立房子”架设电线。一个负责总部首长生活管理的“副官”，也从里头匆匆出来，见刘伯承和伍修权二人，敬了个礼，闪到路边。

刘伯承领着伍修权正要进门，已在屋里的博古忙招呼道：

“来啦？正等你们呢！”说着又用俄语对伍修权道：“您好，皮达可夫同志，你的工作问题，总参谋长同志已经同你谈过了吧？”

伍修权也用俄语答道：“是的，波古良也夫同志，刘总长已经说了，再请你直接指示。”

博古却随便地拉拉他的手道：“好的，我们再说说。”又对刘伯承说：“正好，我们也商定一下……”

原来，伍修权和博古曾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们当时每人都有一个俄文姓名，皮达可夫就是伍修权，博古则叫波古良也夫，回国以后，这个俄国姓氏前两个字的谐音，又成了他的新名字。正如当年也上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将自己俄文姓氏伊斯美洛夫的最后两个字，改为“洛甫”一直在国内使用着。这在那年头也是个十分时髦的风尚，当然也不是人